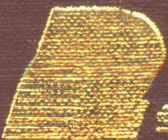


东陆  学库

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

吴承明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东陆  学库

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

吴承明 著

《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吴承明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 人 张丽华
封面设计:徐 辉
责任校对:段建堂

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

吴承明著

*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科技印刷厂印装

*

850×1168 1/32 印张 9.7 字数 234 千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1025-660-2/F·103

定价:(平装)15.00 元

(精装)19.80 元



吴承明近照

《东陆学库》缘起

云南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它的前身东陆大学创办于1922年，至今已有七十余年了。七十余年的发展，经历过许多光辉。尤其在三、四十年代，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教授出任校长，仿照“清华模式”，致力于高水准综合大学的建设，先后聘请了一大批名家执教云大。顾颉刚、楚图南、吴文藻、冯友兰、费孝通、白寿彝、潘光旦、刘文典、尚钺、向达、吕叔湘、姜亮夫、吴晗等等，一时英才荟萃，蜚声海内外。1946年，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云南大学列为中国十五所世界著名大学之一；1980年和1986年该书两次修订再版，云大仍跻身其中。

与自己学校深厚的历史相比，云南大学出版社是一个年轻的学术出版机构，社龄不过校龄的十分之一。但云大出版社沾润学校深长的学术传统，以弘扬学术、推进文明建设为己任，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孜孜以寻自身立足学界的社会价值。

正如名校要靠名师的支撑，办好一个大学出版社，必然要以优秀的学术著作作为社的标识和旗帜。学术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事业，学术著作的出版并非囿于一地、一隅之功，云大出版社也应放眼全国，出版一批高层次、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于此萌发了建立东陆学库之想，旨在收集一批治学严谨、功力较深、在各学科范围内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并逐渐形成规模、贡献于我国的文化积累和现实开拓。

这一想法于九五年提出后，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得到了中国社科院章建刚先生及我省陈庆德先生、杨先明先生的支持。诸位

先生四处为我们奔波组稿，劳力劳心、精神令人感动。特别还要提到，本学库的设立得到昆明万兴房地产公司的支持。公司总经理温宁军先生也是学界中人，曾就读于云南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从事实业，卓然有成。然未忘情学术，并深知其对社会的意义，对学术著作的出版慨然相助，使经济实力不强的我们能最终开始这一事业。

《东陆学库》的建设将是我社的一项长远工程。于此发轫之时，简叙其缘起以告读者。

云南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五月

前 言

1985年我出版过一本经济史论文选集《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本书是选择了1986年至1995年我写的论文19篇,按其内容分编为三个部分:关于经济史理论和方法论的6篇;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的7篇;关于市场问题的6篇。

第一部分论文的背景是,“文革”结束后,百事从新,痛定思痛,在史学界也引起一场反思。1980年起,在北京、上海、武汉的几次关于近代史的讨论会上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来写了一篇《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发表于《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入侵的后果;二是如何评价封建主义的作用。本书中《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主要是继续探讨第一个问题的。文中我评论了对近代中国的两种看法:“沉沦观和近代化”,提出研究近代中国的两种思考:“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本书中《谈封建主义二题》是继续探讨第二个问题的。“二题”指古代封建主义和近代封建主义。“近代封建主义”是1982年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学者访华的讨论会上我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有它独特的特征。

《论广义政治经济学》原是我从事的另一个专题。因为云南大学为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征文出版《史学论文集》,我把该文加上一节研究“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倡议。其实,我所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原来就是指研究经济史的理论。

1984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了一次“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和方法”的报告,1986年又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了一个研究经济史方法论的讲话。我主张“史无定法”,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和外国新兴的各学派的方法,都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条件的可能,选择取用。那时刚行开放政策,我讲话中列举了一些国外各学派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大家觉得很新鲜,因而这个讲稿竟同时有三家期刊刊载。后来我把它整理成文,即本书中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不过,近年来中外交流活跃,人们对国外一些学派和方法已很熟悉,并有创新,我那篇文章已过时了。在收入本书时,我无力作全面修订,只删除了一些事例,而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史理论上。

研究经济史要有历史学的修养,又要有经济学的基础。本书选入的《论历史主义》和《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就是我企图从理论到方法的试作。前一篇以历史主义为主题,因为它是长期支配西方史学的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又与中国的传统史学接近,同时也是五十年代以来遭受批判的靶标,并涉及史学能否变为科学的争论。我的看法是,不能完全否定历史主义,它有它存在的根据和实用价值,而史学要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道路则是肯定的。经济学方面,我认为应当历史地看待经济学的发展,各种经济理论都有其历史背景和地位。然而,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也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而不是推导历史的模式。

本书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的文章。《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是综合我1987年提交两个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而成。针对一时流行的“冲击—反应”模式和“传统—现代”完全对立的理论,我提出中国“内部能动因素”的论点,并力图用实证来探讨这种因素的功效。

除商业和市场另论外,传统经济中的能动因素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是探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传统农业能否承担中国近代化的任务。我的看法是肯定的,但不否认农业落后在一定程度上掣了工业化的后腿。此文作于1988年,曾对近代人口与耕地作了一番估算,近年这方面的研究有飞跃发展,我的估算已落后了,因而在收入本书时全部废弃,改用时贤新论。但这并没有即改变也许更加强了我对近代时期“人口压力”实不足畏的看法。《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一文主要是研究利用手工业的功效,也论到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结合。我认为,在近代中国,确实有人在探索一条立足于本土,工农结合,土洋结合,再进一步现代化的道路。但是,这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终于败于那种以洋行和租界为背景,脱离农村以至对立于农村的大口岸经济的道路。书中《世潮·传统·近代化》一篇二千多字的短文,可代表我对中国近代化问题总的看法。这是我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文题是《近代史研究》的记者替我加上去的,加得很好,我应感谢。

《论工场手工业》一文,是我在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一直注意的问题。过去人们忽视工场手工业(包括散工制)在近代中国经济中的作用,部分地是被“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所拘束,我打破这一概念,把它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处理。这里,我要感谢徐新吾先生。实际是他首先提出中国工业发展中也有“三阶段”的现象的,而本篇得以成文,有赖于他主编的行业史丛刊中的实证材料。

《论二元经济》一文是从理论上探讨不发达经济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并力求给以实证。我认为,西方二元经济论者把传统农业的作用限于为现代化产业提供廉价劳动力是错误的,其关键在于过低估计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在劳动力的转移上我作了一些论证,并比较详细地估计了1933年非农业就业人口。但在农业资源(表现为价值)的转移上,我只作了理论探讨,没有能作出计量分析。

最后一篇《中国资本集成和工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仅是一项参考资料。

本书第三部分是市场问题。这是我八十年代初开始研究的专题。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我国经济史的研究多半还是继承重生产、轻流通的老传统，我发表了关于明代、清前期和近代市场的几篇文章，颇有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近年来情况不同了，商业史和市场史的研究成为热门，宏文巨著迭出，无论在资料发掘或分析论述上都远超过拙作。不过，我并未放弃这个专题，而想继续深入。

辑入本书的，首先是两篇理论性的试作。《市场理论和市场史》一文，阐述了马克思的分工产生市场的理论，而在历史上，各种市场的出现差不多都与分工无关。我试图解开这个矛盾。《试论交换经济史》一文，是根据恩格斯的生产和交换可作为“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的启示，我以横坐标代表历史，试图构造一个交换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式。在这里，交换先于生产，并且几乎成为经济发展的导数。这只是一个大胆的设置。

鉴于我过去所作明代、清代市场的研究已远落后于时贤的新着，应予废弃，我打算从新改作。并改变过去商路、商镇、商品运销等研究方法，转从人口、价格、货币量、商品量等变化入手，即更多地从经济学方面分析市场的周期性变化，另方面探讨它对社会结构、阶级分化的作用或影响。书中《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中国市场》，即相当于明代市场的改作。另有《十八和十九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一篇，在准备中。以需大量资料和计量分析，而我已近耄耋，如能完成，已属幸事。

书中《洋务运动与国内市场》，是提交1994年洋务运动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其中先有一节，论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趋向，即由生产导向论趋向于需求导向论。这是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总需求和市场有效需求成为研究中心。但我

认为,自亚当·斯密提出市场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发展的论点以来,需求导向论始终是存在的。至少对于新式工业的兴起来说,有无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容量,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因而这篇文中,我尽可能地对1869—1911年国内市场商品量的变化作了估计。这样,就可以同我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对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市场商品量的估计汇总,即本书中的《近代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

自我国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史学界也引起热烈的讨论,主要是什么是市场经济,我国历史上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否具有市场经济的功能以及对它的评价问题。本书最后一篇《市场经济和经济史研究》是我在两次讨论会上的发言,说明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本书各篇论文原是单独发表的,不少论述重复。收入本书时我作了一些删节,但为文意完整,仍不免有雷同之处。

本书的选辑和出版,是我的同行吴太昌、李伯重、陈其广、叶坦、刘兰兮等同志首先倡议,并热情推动和大力协助,始得实现的。李伯重并为我写了学术小传。我衷心地感谢他们。云南大学出版社慨允出版本书,施惟达社长大力支持,张丽华、章建刚编审等详为审阅,帮助尽快出版,我在此谨致谢忱。

吴承明

1996年1月

目 录

1 前言

7 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21 谈封建主义二题

29 论广义政治经济学

45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83 论历史主义

101 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115 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
外部因素

127 世潮·传统·近代化

——在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
讨论会上的发言

131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151 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161 论工场手工业

187 论二元经济

205 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
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

- 211 市场理论和市场史
- 223 试论交换经济史
- 243 十六与十七世纪的中国市场
- 277 洋务运动与国内市场
- 285 近代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
- 289 市场经济和经济史研究

- 295 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 李伯重

前 言

1985 年我出版过一本经济史论文选集《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本书是选择了 1986 年至 1995 年我写的论文 19 篇,按其内容分编为三个部分:关于经济史理论和方法论的 6 篇;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的 7 篇;关于市场问题的 6 篇。

第一部分论文的背景是,“文革”结束后,百事从新,痛定思痛,在史学界也引起一场反思。1980 年起,在北京、上海、武汉的几次关于近代史的讨论会上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来写了一篇《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发表于《晋阳学刊》1982 年第 2 期)。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入侵的后果;二是如何评价封建主义的作用。本书中《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主要是继续探讨第一个问题的。文中我评论了对近代中国的两种看法:“沉沦观和近代化”,提出研究近代中国的两种思考:“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本书中《谈封建主义二题》是继续探讨第二个问题的。“二题”指古代封建主义和近代封建主义。“近代封建主义”是 1982 年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学者访华的讨论会上我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有它独特的特征。

《论广义政治经济学》原是我从事的另一个专题。因为云南大学为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征文出版《史学论文集》,我把该文加上一节研究“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倡议。其实,我所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原来就是指研究经济史的理论。

1984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了一次“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和方法”的报告,1986年又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了一个研究经济史方法论的讲话。我主张“史无定法”,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和外国新兴的各学派的方法,都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条件的可能,选择取用。那时刚行开放政策,我讲话中列举了一些国外各学派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大家觉得很新鲜,因而这个讲稿竟同时有三家期刊刊载。后来我把它整理成文,即本书中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不过,近年来中外交流活跃,人们对国外一些学派和方法已很熟悉,并有创新,我那篇文章已过时了。在收入本书时,我无力作全面修订,只删除了一些事例,而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史理论上。

研究经济史要有历史学的修养,又要有经济学的基础。本书选入的《论历史主义》和《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就是我企图从理论到方法的试作。前一篇以历史主义为主题,因为它是长期支配西方史学的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又与中国的传统史学接近,同时也是五十年代以来遭受批判的靶标,并涉及史学能否变为科学的争论。我的看法是,不能完全否定历史主义,它有它存在的根据和实用价值,而史学要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道路则是肯定的。经济学方面,我认为应当历史地看待经济学的发展,各种经济理论都有其历史背景和地位。然而,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也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而不是推导历史的模式。

本书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的文章。《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是综合我1987年提交两个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而成。针对一时流行的“冲击—反应”模式和“传统—现代”完全对立的理论,我提出中国“内部能动因素”的论点,并力图用实证来探讨这种因素的功效。

除商业和市场另论外,传统经济中的能动因素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是探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传统农业能否承担中国近代化的任务。我的看法是肯定的,但不否认农业落后在一定程度上掣了工业化的后腿。此文作于1988年,曾对近代人口与耕地作了一番估算,近年这方面的研究有飞跃发展,我的估算已落后了,因而在收入本书时全部废弃,改用时贤新论。但这并没有即改变也许更加强了我对近代时期“人口压力”实不足畏的看法。《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一文主要是研究利用手工业的功效,也论到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结合。我认为,在近代中国,确实有人在探索一条立足于本土,工农结合,土洋结合,再进一步现代化的道路。但是,这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终于败于那种以洋行和租界为背景,脱离农村以至对立农村的大口岸经济的道路。书中《世潮·传统·近代化》一篇二千多字的短文,可代表我对中国近代化问题总的看法。这是我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文题是《近代史研究》的记者替我加上去的,加得很好,我应感谢。

《论工场手工业》一文,是我在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一直注意的问题。过去人们忽视工场手工业(包括散工制)在近代中国经济中的作用,部分地是被“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所拘束,我打破这一概念,把它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处理。这里,我要感谢徐新吾先生。实际是他首先提出中国工业发展中也有“三阶段”的现象的,而本篇得以成文,有赖于他主编的行业史丛刊中的实证材料。

《论二元经济》一文是从理论上探讨不发达经济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并力求给以实证。我认为,西方二元经济论者把传统农业的作用限于为现代化产业提供廉价劳动力是错误的,其关键在于过低估计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在劳动力的转移上我作了一些论证,并比较详细地估计了1933年非农业就业人口。但在农业资源(表现为价值)的转移上,我只作了理论探讨,没有能作出计量分析。

最后一篇《中国资本集成和工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仅是一项参考资料。

本书第三部分是市场问题。这是我八十年代初开始研究的专题。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我国经济史的研究多半还是继承重生产、轻流通的老传统，我发表了关于明代、清前期和近代市场的几篇文章，颇有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近年来情况不同了，商业史和市场史的研究成为热门，宏文巨著迭出，无论在资料发掘或分析论述上都远超过拙作。不过，我并未放弃这个专题，而想继续深入。

辑入本书的，首先是两篇理论性的试作。《市场理论和市场史》一文，阐述了马克思的分工产生市场的理论，而在历史上，各种市场的出现差不多都与分工无关。我试图解开这个矛盾。《试论交换经济史》一文，是根据恩格斯的生产和交换可作为“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的启示，我以横坐标代表历史，试图构造一个交换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式。在这里，交换先于生产，并且几乎成为经济发展的导数。这只是一个大胆的设置。

鉴于我过去所作明代、清代市场的研究已远落后于时贤的新着，应予废弃，我打算从新改作。并改变过去商路、商镇、商品运销等研究方法，转从人口、价格、货币量、商品量等变化入手，即更多地从经济学方面分析市场的周期性变化，另方面探讨它对社会结构、阶级分化的作用或影响。书中《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中国市场》，即相当于明代市场的改作。另有《十八和十九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一篇，在准备中。以需大量资料和计量分析，而我已近耄耋，如能完成，已属幸事。

书中《洋务运动与国内市场》，是提交1994年洋务运动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其中先有一节，论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趋向，即由生产导向论趋向于需求导向论。这是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总需求和市场有效需求成为研究中心。但我